

李欧梵作品

苍凉与世故

——张爱玲的启示

李欧梵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苍凉与世故

——张爱玲的启示

李欧梵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凉与世故：张爱玲的启示 / 李欧梵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308-19324-5

I. ①苍… II. ①李… III. ①张爱玲 (1920-1995) - 文学研究 ②张爱玲 (1920-1995) - 人物研究
IV. ①I206.7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43409号

苍凉与世故：张爱玲的启示

李欧梵 著

责任编辑 罗人智 寿勤文

文字编辑 闻晓虹

责任校对 马一萍

封面设计 卿 松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0千

版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324-5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小 序

这是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是一种无意间的“偶合”(serendipity)。数年前，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老友林道群建议我写一本这样的书，而且把我的旧稿（包括拙著《上海摩登》中的一章）整理打印出来，作为基础，逼我继续写下去。我当时忙于他务，又不敢贸然从事有关“张学”的研究。因为海峡两岸近年来“张学”方兴未艾，专家辈出，俨然为张爱玲这个传奇人物创造了一个新的传奇。特别在大陆，自从发现了这位被淹没近半世纪的作家及其作品之后，一股新的“张迷”浪潮早已席卷一切。我在震撼之余，哪里还敢闯进这个新“热区”。

然而，我毕竟也算一个“张迷”，否则也不会在一本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书中故意加上一章讨论 40 年代沦陷区的张爱玲，并将之与香港联系在一起，形成文化史上的“双城记”。既然成了这一观念的“始作俑者”之一，我遂也不自觉地从香港文化的立场来重睹张爱玲作品的风采，于是很自然地加深了对于《倾城之恋》这篇小说的热爱。其实张爱玲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至少还有两篇，为什么我独钟此篇？这当然又和我个人的“倾城之恋”有另一种偶合的关系，就在香港回归后不久，我终于和认识已久的子玉重归前缘，在千禧年（2000 年）结婚。而在此之前，我写就的一篇小说《范柳原忏悔录》则成了“前奏曲”。

其实这篇小说是我 1997 年时心灵中感受到的一种说不出的对香港的深情，借张爱玲的小说人物表达出来的。一个都市的“陷落”却

促成我感情上的“回归”，这个人生的巧合恐怕也可作为小说题材吧！然而我独缺小说家的才华，写了一本“后现代”式的小说之后，深觉画虎不成反类犬，还是回归到文化评论和研究的领域，也不自觉地写了几篇有关张爱玲的文章。又适逢香港话剧团演出《新倾城之恋》，因此也带出我自己的又一章“倾城之恋”。现在把这些学术性或非学术性的长短文章一并收集于此，诚可为部分“张迷”解解闷，予愿已足。

本书以“苍凉与世故”为题，如用英文则是“Desolation and Sophistication”，前者是张爱玲自己的美学观念，后者则是我自己的看法，已在本书中不厌其烦地再三阐述过了。最近读到刚出土的张爱玲的小说《郁金香》，颇有感触。我觉得这篇当年在上海《小日报》刊登的连载小说，文笔不错，有典型的张爱玲特征——“如同”“仿佛”等字眼后出现意想不到的形容句子。且让我抄两小段：一是开头描写墙上的山水画和所配的沉甸甸的红木框子，“很不相称，如同薄纱旗袍上滚了极阔的黑边”；一是描写阮太太“是一个无戏可演的繁漪，仿佛《雷雨》里的雨始终没有落下来”。这一类的句子，也只有张爱玲才写得出来。模仿的人不是没有，但就差那么一点火候。

这“火候”从何而来？行家和“张迷”曾多番论到她受旧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影响，但我认为并不尽然。这一种略带讥讽的比喻是出自一种“反讽”（irony）的手法，反讽必须有距离感，而且至少要指涉两个层面。前面引到的《雷雨》则又多了两层，变成四面：阮太太和周繁漪的比喻在先，又附带把曹禺的剧本名称也讽刺了一番。张爱玲一向不怎么看得起五四新文学，此又是一例。

然而张爱玲也有她“新”的一面——就是一种“世故”的视野——得自她喜欢的英国小说和好莱坞喜剧影片，这种视野往往是从故事外的叙述者的口吻和角度表现出来的。《传奇》再版的封面就是一个很好

的写照：上面画着一幅旧式的仕女图，但却有一个现代女子在窗外窥视。这个现代女子不一定就是张爱玲，但却代表一种新的视角；有了这种视角，旧的人物和故事也会被“看”出新意来，更起到反讽的效果。我最喜欢的《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可惜的是，张爱玲的佚文中，“旧”的故事愈来愈多，而新的视角却愈来愈少。在《郁金香》中几乎感觉不到叙事者的涵养和看法，叙事语言中多的是交代人物关系，却少了一份反讽。故事后半部逐渐转入男主人公宝初的主观感受之中，时过境迁之后，在电梯上仿佛（又是一个“仿佛”）听见有人唤了一声“金香”，他震了一震，事后又觉得惘然。这种轻描淡写的伤感手法，也似曾相识，《白玫瑰与红玫瑰》有之，《半生缘》中更多，伤感之余，反讽的成分则荡然无存。张爱玲写旧社会，自从《金锁记》之后，再也表现不出那么撼人的“张力”了。

《郁金香》只是一首小曲，《金锁记》才是大戏。

我在书中虽曰“世故”，但个人却颇“天真”，近年来更有返老还童的趋势，这一切皆得自我妻子对我的“启示”。这本书当然献给她。

2006年5月16日于九龙又一城居所

趁这次浙江大学出版社再版本书，特补上两篇最近的文章，也算是代表近年来我的“张学”研究兴趣和方向，或可使这本小书的内容不至于那么单薄。

2019年4月28日于香港

目 录

第一部分 张爱玲的启示

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和“现时感”	3
看张爱玲的《对照记》	29
张爱玲：沦陷都市的传奇	40
不了情：张爱玲和电影	84
香港：张爱玲笔下的“她者”	97
从《温柔陷阱》到《情场如战场》	102
苍凉的启示	111
张爱玲与好莱坞电影	113
张爱玲的英文问题	119
跨语境跨文化的张爱玲：一些感想	131

第二部分 睇《色，戒》

《色，戒》的回想 144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51

走出张爱玲的阴影 162

李安对张爱玲的挑战 177

《色，戒》的历史联想 189

附录一 Lust, Caution : Vision and Revision 234

附录二 真假的界限（郭诗咏） 243

第一部分 张爱玲的启示

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和“现时感”

一、日常生活面面观

在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初版里附有一张她的照片，据柯灵回忆，相片下还有一句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两句话出自她的小说集《传奇》再版自序，是把原文中的两句话串连在一起的。在这篇序的第一段，她谈到去报摊看自己的书销路如何，不禁自励道：“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然后又催自己：“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在第二段她才讲出一番“大道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②

① 柯灵：《遥寄张爱玲》（写于1984年11月22日），《读书》1985年第4期。后收于柯灵：《文苑漫游录》，香港：三联书店，1988，第48页。

② 张爱玲：《传奇》再版自序，《张爱玲典藏全集》第八卷，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皇冠”），2001，第30页。

一直到全文的最后,她才说出“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这句话来,也为上段出名须趁早的虚荣心态做了一个注解。然而,这仍然像是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未免引起不少人的非议,更遑论她的“政治不正确”——竟无“感时忧国”的精神。^①然而这段序言对张爱玲至关重要,她的多篇散文皆是为此个人生哲学来做阐释和注解;这些话语,看来十分琐碎,但如果放在一种“现代性”(modernity)的理论框架中来审视,则可发现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少有的“现代感”极强的作家,恰是由于她掌握了这个“现时”(present, now)的深层意义。

1

且让我们先从张爱玲在1945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看苏青》^②谈起。

张爱玲自己承认:“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她和苏青似乎所见略同(其实张爱玲的观点远较苏青《结婚十年》中的平铺直叙有深度),都觉得她们身处的“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然而张爱玲却为这个“非罗曼蒂克”^③的心态做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注解: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所以我

① 最著名的当然是迅雨(傅雷)那篇名文《论张爱玲的小说》(1944年)。

② 《天地》第19期,未收入《流言》,后来收入她的《余韵》,台北:皇冠,1990,第81—99页。亦收入《张爱玲典藏全集》第八卷,第260—277页。

③ 耿德华(Edward Gunn)《抗战时期的张爱玲小说》,即从此观点出发;该文(王宏志译)收入郑树森编:《张爱玲的世界》,台北:允晨文化,1989,第49—87页。

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

在这段话和这篇长文中,张爱玲并没有解释什么是“物质生活”,只说它是“与奢侈享受似是不可分开的”,但又没有进一步解释。以“后现代”的角度看来,这当然指的是商品和消费,然而张爱玲虽在文中提到她初次领略到去百货公司购物是一种“消遣的好方法”,却没有在购物方面着墨许多。她那个时代毕竟还是资本主义文化在上海初兴的时代,对于“消费文化”尚未达到如今以消费为欲望和生活的程度。所以我认为她所谓的物质生活,指的不是奢侈享受,而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世俗性,而世俗的定义是和钱分不开的,因此她在此文中说:她和苏青“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中国古今文人可以穷而酸,但绝不肯定金钱的价值,而张爱玲似乎早已具备一种“小资”的情操,甚至觉得她自己天生俗骨,甚至“俗不可耐”。^①无怪乎近年来张爱玲的作品在中国一直畅销不衰,甚至成为“小资”和“波波族”^②的“宠物”。

如果张爱玲作品的意义仅止于此,则没有继续讨论的余地了。在她眼中,世俗的物质生活显然并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已,而有其他更广泛和深层的意义。

综观张爱玲在1939至1947年写的散文,特别是收集在《流言》

① 《张爱玲典藏全集》第八卷,第269页。关于张爱玲的“世俗性”,王安忆亦有同感,见其《世俗的张爱玲》一文,收入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第269—274页。

② 所谓“波波族”出自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天堂里的波波族》(BoBos in Paradise)。BoBo指的是Bohemians(波西米亚人)和Bourgeois(布尔乔亚)的综合体。

中的文章，不难发现内中的主题就是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更衣记》谈的是从古至今时装的演变；《公寓生活记趣》顾名思义讲的是她幼时在上海住的公寓，虽然大楼里住了中外各色各样的人，她却更喜欢听公寓外的“市声”；《道路以目》谈的是“行”，特别是寒天清早行过的小饭铺、人行道上的小火炉、深夜橱窗里的模特儿和霞飞路西洋茶食店中的蛋糕，很自然地也由“行”扯到“食”；《有女同车》中的素描背景是电车，物则是电车上女人；《童言无忌》中小标题是“钱”“穿”“吃”“上大人”和“弟弟”；《说胡萝卜》中谈的又是吃——萝卜煨肉汤；《私语》更是一篇日常生活回忆总其大成的文章，内中除了亲戚人物外，谈得最多的依然离不了衣食住行，甚至把其中的色香味都描绘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松子糖——“松子仁春成粉，搀入冰糖屑”——喂给生病的弟弟，让人联想到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玛德莱娜”小蛋糕（petite Madeleine）。她也写到其他日常生活的细节，诸如“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父母离婚后她的颠沛流离，在母亲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还有在父亲家被禁闭在空房里，想到家里楼板上反照的蓝色的月光。一切都和她私人的日常生活有关。

我之不厌其详地举出上面一系列张爱玲描写衣食住行的例子，为的是阐明日常生活这个主题在她作品中的主要地位。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是最单调的主题，因为它脱离不了“日常”（quotidian）行为习惯的重复，然而在张爱玲笔下，它们却代表了都市生活中的一种“文明的节拍”，充满了五光十色的刺激，这就是她所熟悉的上海。换言之，都市文化是这个日常生活的固定场景，由私人和家庭的空间

延伸到公共的都市交通工具和街道上的人生百态。对张爱玲而言，这是同一个世界，“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喜，向来是打成一片的”。值得后世理论家注意的是：这个张爱玲的世界仍然是一个人情味极浓的“人际社会”（*gemeinschaft*），而非现代都市文明所建构的“理性社会”（*gesellschaft*）。在她的作品中，也很少提到“疏离感”（*alienation*），除非是自己幼时在家中与父母亲的疏离。她所描写的上海都市生活和人物，反而会使她产生强烈的归宿感，所以她做出一个宣言——“到底是上海人”，甚至在写香港时也“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①这种归宿感，也令她感到一种稳定和平安。

问题是她又自觉是活在“乱世”，在乱世中活下去而且活得开心，则需要一番努力，日常生活就变成了“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在《我看苏青》文末，她写下这一段挚情的文字，意义深远：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

①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典藏全集》第八卷，第8—9页。

这一段话，恰好可做本文开端所引用的《传奇》和《流言》的序言中几句话的解说。“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也就是她的“苍凉”或“荒凉”美学的来源，是一种“夕阳无限好”的情操，但她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并不年老，尚不到三十岁！所以她对于时间的急促和逼迫感（“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的感受和年岁无关，而是一种“现时”的焦虑。这一段话的另一个悖论是：她越是希望“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越是平安不得，因为她预感到这个时代和文明“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2

《流言》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发表于沦陷后的上海（1943年8月至1944年12月），也正是在“大破坏”之中的一段喘息时间。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如何书写和发表自己的文章，并借此成名，也是一种“现实”的考虑。也许张爱玲只能“粉饰太平”，写一些和抗日战争无关的文章（其实她在这一个时期写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提过一次日本统治），但从她的人生观角度推论，可能就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时期，所以日常生活的描述和回忆更显得珍贵。

在这些散文中，她的视野与她文章所描述的人与事，似乎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种保持距离的“隔”法，是她的写作技巧的一贯特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她甚至认为这种态度有如“高级调情”，“可以保护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应用到别的上面，这可以说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结果是轻描淡写的，与生命之间也有了距离”。然而，我认为至少有一篇文章是例外——《烬余录》。

《烬余录》发表于1944年的2月（《天地》第5期），约在《倾城之恋》发表（1943年9月至10月）四个月之后，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非常

明显：《倾城之恋》小说的下半部就是以《烬余录》中所描写的日军侵占香港为背景，小说只不过加上了两个虚构的主人公（范柳原和白流苏）和前段的上海背景。但《烬余录》所写的时间跨度则较短，1941年冬，地点也更集中——香港大学的宿舍及其附近^①。内中的主要人物炎樱也成了她的好友和其他散文中的主角。此篇散文更重要的意义是它把战乱和世俗的日常生活放在同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因而造成了张爱玲所特有的历史视野：她不但把历史的“大叙述”或“主旋律”放在故事的背景后，甚至故意将之描写得很模糊（日本人何时开始攻打香港，如何轰炸，如何占领，只字不提），而且把日常生活的现实放于前景。然而正由于这个历史和日常生活的“错置”，才使得这篇散文显得更加不凡。

描写中国人民抗日的故事很多，但大多是有血有泪的伤感式叙述，感人有余，“剧力”不足，因为没有“距离感”，更没有任何反讽或讽刺的意味。《烬余录》相反，文章一开始就剧力万钧，十分生动：“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②真是既写实又荒谬，把战争的降临看作赴宴，张爱玲这一笔就勾画出港大学生的贵族式生活。这一种“阶级”观的讽刺性并非完全出于自身经验（当时的张爱玲也可算是较穷困的上海贵族），而是出于一种荒谬的反讽（irony）：请客或赴宴本是这群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但是战争（或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这些“上流社会”出来的“天真姑娘”（ingénues）

① 陈子善编的《流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中附有与各文相关的珍贵图片，包括港大的学生宿舍梅堂（May Hall），现已拆，但照片中前一幢建筑仍然保存，现亦称“梅堂”。

② 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典藏全集》第八卷，台北：皇冠，2001，第113页。